



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
NANKAI UNIVERSITY
100th Anniversary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第一辑）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杨瑞森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第一辑）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杨瑞森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 杨瑞森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8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第一辑)

ISBN 978-7-310-05880-8

I. ①毛… II. ①杨… III. ①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A84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8650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运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240×170 毫米 16 开本 27.75 印张 4 插页 464 千字

定价:110.00 元

如遇图书装帧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出版说明

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南开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推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我们将陆续出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集中展示南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发展和创新方面所做的贡献。文库将以专著、文选等多种形式，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活力和生命力。

此次结集出版的为第一辑，共 10 种，分别为：《季陶达文集》（季陶达）、《魏坝文集》（魏坝）、《“返本开新”的哲学之路》（陈晏清）、《新世纪的文化思考》（方克立）、《高峰文集》（高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杨瑞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历程》（刘景泉）、《人性的探索》（王元明）、《党史党建研究文集》（邵云瑞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张向东）。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著述或收录于书中的一些文章，有不少之前在别的出版社出版或在报刊上发表过。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书中有些观点今天看来难免有所偏颇或值得商榷；语言文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体例格式等方面，也有不符合现行规范之处。但为保持这些著述的原始风格，我们在编辑出版时除对一些明显的错误做了更正，对个别不合时宜的内容做了适当删改外，其他均遵从原著，未予改动。恳请广大读者在阅读这些著述时，能有所鉴别。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8 月

序 言

在南开大学隆重纪念百年校庆之际，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这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文集，这是南开大学领导同志和朋友们对我的厚爱和鼓励，我深表谢意。

从 1972 年到 1989 年，我在南开大学工作了 17 年。先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研室主任，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教学与研究，并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后到南开大学马列教学部（今马克思主义学院）任主任，从事全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与管理工。应该说，我人生中最青春的年华是在南开大学度过的，那个年代所经历的许多往事，至今仍经常萦回于脑际；我人生中结交了不少知心朋友，其中多数是南开大学的同事和忘年之交的学生，他们至今仍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最难以忘怀的是，我人生中最基本的工作能力、思想品格和学术素养，是在南开大学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社会实践中养成的。这些能力、品格和素质的养成，对我后来奉调教育部工作，乃至退休后的老年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我调离南开大学 30 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但依然怀有深厚南开情结的深层缘由。

本文集所收录的作品，都是我退休之后撰写发表的学术研究论文。我作这样的选择，主要不是为了显现自己退而不休的状态，而是为了彰显一名长期从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工作者，在退休之后仍然保持着对原来所从事的学科专业的理论探索和科研追求精神。在我看来，一方面，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特定理论成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或新时代是否仍然具有重要价值，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阐发的。在我国学界和思想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也有着不同看法和声音，需给以明确的回应、分析和澄清。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的理论体系中所蕴涵和贯穿的深层哲学思想及其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思想、新境界和新贡献等问题，也都需要加以深入学习、研究和认真把握、贯彻。由此看来，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问题，这既是我们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的时代责任，也是我们这些高校思想理论教育战线的“老马列”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主题教育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方法问题十分重要。毛泽东同志曾把方法比作过河的桥或船，认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同样的道理，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问题，也需要有科学方法论指导，需要有科学的研究视野和认识方法。就我个人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代价值问题的学习和研究而言，其方法论可以简略地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特征有一个整体性把握，要着力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上去揭示和把握以往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中所蕴涵的深刻的普遍性哲学道理。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其思想理论形态而言，它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它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体。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形态，它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所讲的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在我们党领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正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领导与群众等这样一些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我们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特定理论成果，其本身不论在理论内容上还是在理论成果的表述方式上，都必然具有特定的历史性或时代性特征，须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充实、完善和创新。然而，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的理论内容和方法论原则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长远的实践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说过，关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同样的道理，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代价值问题，亦应正确认识和处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辩证关系，善于从不同时代所产生的理论形态的特殊性中揭示和把握其中蕴涵的深刻的普遍性道理，从历史的即实践的经验中揭示和

把握社会发展和革命事业发展的本质或规律性。1981年6月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所作的概括和分析，既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所作的经典表述，也是从历史的经验中揭示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代价值的方法论典范。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所作的《坚持好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讲话中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习近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讲话，从理论内涵上为我们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

其二，要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我们党在新时代和新时期对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着力揭示和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贯穿的深刻的哲学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的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传家宝或看家本领。因此，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问题，就需要着力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间内在的本质联系，着力研究和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贯穿的深刻的哲学内容。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质上是实践的和发展的哲学。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问题，就必须着眼于其特点和发展，着力研究揭示和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贯穿的深刻哲学内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和新贡献。我们看到，自觉地和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时代习近平治国理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鲜明的思想理论特色。从新时代的开启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蓝图的总体设计，从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全面把握到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条战线的有序推进，从对群众最关注的重大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深刻认识和有效解决，到对解决某些具体领域具体问题的顶层设计和重大举措，从科学思维方式和崇高政治品格的倡导，到保障性体制机制的创立，等等，

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光辉。习近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人所独具的优良的政治品格和崇高的价值追求、精神风范紧密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指导，形成了一整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方法论。深厚的为民情怀、强烈的忧患意识、坚毅的使命担当、顽强的实干精神、切实的政策举措，这些思想理论内容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内涵，也是贯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深邃的哲学精神。习近平治国理政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的理论特征，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高度统一起来。这一方法论的科学性，已被十八大以来在实践上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加以证明。历史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成果、新贡献、新境界，是对我们党自觉地和创造性地学哲学、用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弘扬和升华，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和新时期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进一步成熟的显著标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未来充满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的强大理论依据。

其三，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视野去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着力研究、揭示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科学阐明毛泽东和习近平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从而揭示和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活动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党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也是近代以来我国思想文化界和理论界关注及论争的重大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其政治本质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宏观视野或科学范畴中去研究，而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内涵、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作出实事求是的总体性分析和评价，而不能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要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到我们党领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去研究，要着力研究和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根据与文化渊源这两者间的区别与联系。一方面既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深刻，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它还不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因而不可能用来认识和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救中

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要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具体实际”的科学内涵自身就包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和条件。要着力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同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从而揭示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对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本质要求。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共产党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有过明确论述和科学概括。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是中华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它本身正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理论成果，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或进入成熟时期的标志性论著。“两论”不论就其深刻的理论内涵而言，还是就其理论的阐述方式而言，抑或就其语言的通俗性、明晰性而言，都鲜明地表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智慧、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关于毛泽东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讲话中曾有一段重要论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这个论断和评价是正确的、深刻的。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和新时期，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讲得很多、很重、很新、很深，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并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就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依据作出了明确界定。他着力研究、分析和揭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性即关系，强调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他把中华 5000

年文明史、世界 500 年社会主义思想史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联结起来，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逻辑的统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历史，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过程。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崇尚向善友爱、包容互鉴、和谐共生的思想理念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矛盾同一性的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对解决国际问题的指导，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和发展方略，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与民众的广泛赞誉和拥护，充分展现了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方案。总之，在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其四，要用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去关注和研究重大的现实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要着力从思想理论上即学理上对以“非毛化”为主要表现的当代社会思潮予以认真深入的分析、批判和澄清。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代价值问题的研究，必然会涉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某些重大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需要加以深入研究。比如，关于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总体性评价与阶段性分析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理论来源与文化渊源的关系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性问题，关于我们党的学哲学用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问题，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贯穿的深层哲学思想的认识、概括和把握问题，等等，都需要加以深入研究。此外，亦应高度关注意识形态领域中“非毛化”社会思潮的长期存在及其消极影响，着力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对“非毛化”社会思潮进行深入批判。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者要强化自身的学养能力和水平建设，着力从理论的或学科的角度与高度上去思考和研究重大现实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着力从学理上回应和批判各种错误社会思潮，澄清思想理论是非。在思想理论教育工作中，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性、政治性、针对性同其理论性、科学性、真理性紧密结合起来。

应该说，我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问题的研究上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也想力求有所创新。但是，严格说来，我的这些研究不论就所阐发的基本观点而言，还是就所秉持的研究方法而言，都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新意，只是一名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者的学习心得和研究体会。其中，许多论点也

多为学界共识。中国人尊崇的一句名言，叫作“活到老，学到老”。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之树是常青的。我将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的学习与研究继续进行下去。

杨瑞森

2019年8月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	1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3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中的几个哲学问题·····	4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定位问题的科学界定和阐发·····	5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哲学思考·····	6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几个哲学问题·····	9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十个理论问题·····	105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研究述评·····	148
制定《历史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161
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	205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几点看法·····	2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	
——兼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217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的几点新认识·····	234
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科学界定与阐发	
——学习十八大精神的体会·····	245
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哲学揭示与阐发	
——兼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252
认识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新视野和新举措	
——访本刊顾问、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杨瑞森教授·····	274
深入研究和把握邓小平两大历史性贡献的关系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	288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	293

2 ·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题

——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

几点体会 307

毛泽东同志对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贡献 320

习近平语言力量的深刻意蕴

——读《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有感 327

关于正确对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兩個认识问题 337

践行基地的经验启示与抗战胜利的理论思考 344

肩负起崇高的历史责任 364

关于“两论”的当代价值

——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 80 周年 38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成果和新境界

——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两点体会 420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哲学。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的主体，是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这个问题包含着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近代中国的哲学变革和思想文化论争，也是围绕着这一历史主题而展开的。解决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需要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中国传统哲学在新的社会矛盾面前显得完全无能为力，甚至成为社会前进的阻碍力量，成为近代哲学变革的对象。从西方引进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等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理论，也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历史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为中国人民解决这一历史任务提供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要真正发挥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使之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时，还必须批判地继承和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哲学，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合，并为现实斗争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天地。

* 本文为教育部社科司组编，并由方克立教授任主编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参考用书《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的第七章。1998年8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近代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曾经有悠久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的中国，在近代陷入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苦难深渊中。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始终没有间断过对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辛探索。“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①这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所形成的基本共识。于是，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引进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与此同时，还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包括辛亥革命那样伟大的革命，也都统统失败了，于是又开始了为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探索。到本世纪初期，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和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启示，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重新考虑中国社会出路问题的工具。从此，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都出现了崭新的变化，从而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特别是需要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革命理论的指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1. 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只有两个基本的对抗性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办企业，以及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开始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新兴的阶级。这两个新兴阶级的出现，使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不仅存在着原有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且还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

^①《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等等。从总体上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 80 年间，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阶级压迫，曾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波澜壮阔的英勇斗争，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所有这些斗争，对于动摇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阻碍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瓜分中国，以及促进人民的觉醒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相适应，曾经出现过各种反映这些斗争并为之服务的思想理论。其中既有地主阶级开明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改良主义思想，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提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还有农民阶级提出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思想文化的落后，也由于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因而中国自身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于是，“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进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②。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一个时期内，学习“新学”即西学形成了热潮。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都学；向日、英、美、法、德等国派遣留学生数量之多，居于世界各国之前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被大量地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在国内，废科举、兴学校成为一种时尚，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当时诸多先进的中国人中，“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③。

作为“新学”的哲学基础，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④。他们企图以此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新学”的拥护者们力图用进化论的观点来同当时统治中国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封建主义形而上学传统观念作斗争，并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根据。比如，康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1 页。

②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14 页。

③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69 页。

④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1 页。